

清代民间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 与“明室宗裔”旗号

刘 小 萌

满汉矛盾贯穿于清朝统治的始终。在汉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,“反清复明”活动曾产生深远影响。民间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始终离不开以“明室宗裔”相号召,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。这一活动席卷地域广,持续时间长,由盛而衰,具有阶段性特点。本文就此分顺治、康熙、乾嘉、晚清四个阶段加以考察,并就其变化背景及特点作了分析。

关键词:反清复明 明室宗裔 朱三太子 满汉关系 辛亥革命

作者刘小萌,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
地址: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,邮编100006。

顺治元年(1644),清廷定都京师。随着清军南下,南明政权相继覆亡,意味着全国大规模抗清斗争的终结。此后,明遗民反异族统治的斗争,集中表现为“反清复明”的诉求;与之相表里的,即是“明室宗裔”的旗号。这一斗争由盛而衰,几乎贯穿清代始终,因此具有持久性;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特点,因此具有阶段性。关于清初“朱三太子”案真相,前辈学者孟森已有深入研究,^①但学界对而后近二百年间,民间打着朱明宗裔旗号掀起的反清(反满)活动,尚少系统梳理;对决定其兴衰之迹的历史背景亦少分析。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。

一、顺治年间的反清活动与故明“太子”

明朝皇室人口众多,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动荡,不少皇室宗裔散落民间。至于崇祯帝诸子下落,其说不一。《明史》记载,崇祯帝有七子,第一子朱慈烺,第二子怀隐王朱慈烜,第三子定王朱慈炯,第四子永王朱慈炤,第五子悼灵王朱慈煥,第六子悼怀王与皇七子。其中,第二、五、六、七子均殇。又称,李自成陷京师,太子慈烺落入自成之手,封“宋王”。待李自成兵败西走,太子不知所踪。^②第三子定王慈炯和四子永王慈炤,为李自成抓捕亦不知所终。《明史》所列诸子名及排行,与其他文献所记牴牾,故不可信以为据。

关于清初明室最大疑案,是太子下落与真伪问题。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一二记载,顺治元年岁

① 参见孟森:《明烈皇殉国后纪》,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上册,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② 参见《明史》卷120《庄烈帝诸子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
末,京师发生诈称皇太子事件,有刘姓者,自称崇祯帝太子。内监杨玉给他换衣服,送至故明周皇后父周奎家。时崇祯帝公主亦在周家。相见掩面泣,周奎跪献酒食。既而疑其伪冒,具疏以闻。清廷为辨真伪,命传故明贵妃袁氏及东宫太监辨视。皆表示不识。问以宫中旧事,亦不能答。袁氏等皆认为伪,而花园内监常进节、指挥李时荫等坚持是真。下法司覆勘,得假冒状。杨玉、李时荫等十五人皆论死。御史赵开心疏中,曾有“太子若存,明朝之幸”语,清廷认为是他留恋胜朝的真情表露,初亦论死,后清帝谕旨从宽,才幸免一死。

关于太子真伪,后世说法不一。清人全祖望《题戾园疑迹》一文,认为真太子先已被李自成兵害于通州东门外,以后现身者“皆非”。^① 清初统治者既定谥太子是假,铸成大案,全祖望当然不敢质疑。至民国初,黄鸿寿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,言太子是真,述其被清廷杀害事甚详。^② 孟森复广征博引,辩正其为真太子,并说:“证太子之假冒者袁妃,其实袁妃即假冒也。”^③ 清廷指鹿为马,意在斩草除根。在事件审理过程中,摄政王多尔衮曾表示:“有以真太子来告者,太子必加恩养。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。”^④ 实际情况却是,清廷对有关明皇太子传闻一向保持高度警惕,防其成为反清活动导火索。

顺治年间,清军在南下过程中,连续剪除明宗室福王朱由崧(年号弘光,在南京),潞王朱常淂(在杭州),鲁王朱以海(在浙东),唐王朱聿键(年号隆武,在福州),桂王朱由榔(年号永历,在西南)政权。其中,永历政权抗清历时最久,声势最大。顺治十五年末,桂王逃入缅甸,不久被吴三桂处死。此后,东南沿海虽有南明将领郑成功继续抗清,但清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秩序已基本建立。

清廷在征服全国过程中,前有南明政权抵抗,后有明遗民反抗,如何对待前明宗室贵族,是一个不能不予以重视的问题。明朝开国伊始,实行同姓贵族分封制。自洪武至崇祯,历代先后敕封亲王六十三。亲王嫡长子是王位继承人,余子封郡王,郡王之下,又按血脉亲疏和世系依次封为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、奉国将军、镇国中尉、辅国中尉、奉国中尉。亲王就封之后,在当地设王府(亦称“藩国”)。他们坐食岁禄,广占田土,拥有巨大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。至崇祯末年,尚存亲王二十八。^⑤ 明室宗藩虽经明末农民军沉重打击,在中原各地仍保有一定实力。顺治帝即位诏中,为安抚前明宗室贵族,曾有“首倡投诚、先来归顺,赴京朝见者,仍给禄养”之承诺;攻克南京,再颁恩诏,重申“遇明朝子孙,素从优厚”。据说清廷曾待晋王以“殊礼”,他如江西益王、淮王,湖广惠王、桂王,四川蜀王,广西靖江王等,似乎也受到优待。^⑥ 但就全局而言,对明室宗藩以严厉打压为主,当无异议。具体措施有四:

1. 没收地产。明室宗藩大地产称皇庄,主要集中在北直隶顺天、保定、河间、真定等府。诸王庄田(王庄)则遍及全国,分布在各王府所在地及周边地区。其中,仅山东济南德王、袁州鲁王、青州衡王,“原封及私置王庄不下万余顷”,^⑦ 其他诸王田产,数额亦很可观。顺治二年九

① (清)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29《题跋》,清嘉庆十六年刻本。

② 参见(清)黄鸿寿:《清史纪事本末》卷5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,第36—37页。

③ 孟森:《明烈皇殉国后纪》,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上册,第30页。

④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12,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,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。

⑤ 参见张显清:《明代宗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7年第2期。

⑥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9,顺治元年十月甲子;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(顺治朝),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,第110页。

⑦ 《噶达洪题明藩田产租银开支已有项数难以再动支事本》,顺治十年正月十七日,《顺治年间清查起科明藩田产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4辑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155页。

月,清廷宣布没收河间、滦州、遵化等府州县、山东德州、临清州、济南府、江北徐州、直隶属顺德府、山西潞安府、平阳府等处无主地及故明公、侯、伯、驸马、皇亲地,拨给驻防满洲官兵。四年正月,圈占畿辅各州县故明勋戚土地,拨给八旗官兵。七月,宣布将全国明勋戚赏赐地、私占地入官。同时,宣布各省前朝宗室禄田钱粮,与民田一体起科,造册报部。^①通过上述措施,基本铲除了前明宗藩的经济特权。

2. 革除宗室名色。明室宗藩生活优裕,又广纳妻妾,因而使宗室人口迅速膨胀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载于《玉牒》的宗室人口为十五万七千,迄明末复增数十万,^②成为寄生性极强的特殊利益集团。清朝入关初,为减少进军阻力,曾宣布“前朝诸王,仍照旧爵”。^③不旋踵即将“恩例”弃置脑后。顺治三年,清军定江西,时故明宗室团聚省城者近数千人。清廷谕:其宗室名色,概行革除;犯法者与小民一体治罪。^④此举,意味着革除前明宗室的政治特权。

3. 遣送京城。清廷入关初,凡降附诸王均留置京城。随着旌旗南指,有将各地藩王送京之举,首当其冲者有山东青州衡王世子朱由榘。安致远《玉璫集·李将军全青纪事》载明青州守将李士元给朱由榘呈文,内称:“山东豪杰荷戈砺刃,大者数万,小者千百为群,引领以望王义师之起。胜兵百万,可传檄而集。”但怯懦的朱由榘拒其建言。不久,清军克青州,衡王府被严密看守。顺治二年九月,朱由榘奉旨入京,随行至亲眷属有妃田氏并子女数口,滞留青州的尚有庶母刘氏、卜氏,嫂李氏、孤孀长女及宫人一百三十八口。^⑤衡王世子入京未久,即发生震动朝野的明诸王“谋为不轨”案。《清世祖实录》顺治三年五月壬戌:“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,谋为不轨。及行查,果获鲁(潞)王、荆王、衡王世子金玉银印。鲁(潞)王等十一人伏诛。”潞王封地在河南卫辉府、荆王在湖广蕲州府、衡王世子在山东青州府,其余数人情形不详,均应为明宗室。此案疑点在于:朱由榘辈先前既已主动乞降,怎敢在清廷重兵监视下“谋为不轨”?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,既然是“私匿印信”,消息又如何走漏并在京城不胫而走?退一万步讲,诸王即便藏有旧印,也不过是怀故国之想,据此断其“谋为不轨”,显然过于武断。因此,不排除清廷有借兴此狱震慑明降藩之可能。清帝还为此辩解说:“其降附诸王,尽加收养,乃不知感恩图报,反妄有推立,鲁王等私匿印信,将谋不轨。朕不得已,付之于法。”^⑥实际情况是,衡王世子等被处死后,清廷仍不罢休,遣官至青州,“籍府中宫眷财物”。^⑦王府亦被拆毁铲夷,盖造兵房。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卷二《林四娘》,记她生前为衡王府宫人,遭难后化为丽人与青州道陈宝钥相恋。赋诗有:“静锁深宫十七年,谁将故国问青天,闲看殿宇封乔木,泣望君王化杜鹃;海国波涛斜夕照,汉家箫鼓静烽烟,红颜力弱难为厉,蕙质心悲只问禅。”^⑧即影射衡王府被抄、宫人

①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20,顺治二年九月甲子;卷30,顺治四年正月辛亥;卷33,顺治四年七月丙寅;卷25,顺治三年四月乙酉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(顺治朝),第162、173页。档案俱详《顺治年间清查起科明藩田产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4辑。

② 参见张显清、林金树等:《明代政治史》上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,第50页。

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(顺治朝),第33页。

④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25,顺治三年四月乙酉;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100页。

⑤ 参见《登莱巡抚杨声远启本》,顺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,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:《明清史料》丙编第三本,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,第274页。

⑥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26,顺治三年五月壬戌。

⑦ (清)朱廷佐撰:《圆寂清静禅师比丘尼李姑墓志铭》,引自周郢:《林四娘本事新证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2005年第5期。

⑧ (清)蒲松龄:《聊斋志异》卷2《林四娘》,清铸雪斋钞本;安致远《青社遗闻》卷3亦有类似记载。

罹难一事。同年六月,清廷谕兵部:“闻青州、大同,尚有故明亲王郡王在彼寄居,恐被流言诬害,致取罪戾。”下令查明“并其眷属,委拨官兵,护送来京”。其他地方“有废藩寄居者,俱令查明奏闻”。^①清廷屡颁严旨,传谕全国,督催解京藩王亲亲子孙,疏远散宗仍准留居原地,此令在各地旧藩中引起极大惶惧。山东玉田王闻讯“破碗刎颈”,齐东王“数日不食”,两王妃“相继自缢”,各郡王“心怀疑虑”,“郡王之外尚有宗室及各王亲戚甚多……人人恐惧,众心甚是不宁”。^②此举意味着,清廷通过强制送京,加强对明室亲藩的控制,同时斩断其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,清廷虽有远宗不必送京之谕,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流动迁徙自由。反之,对那些隐名埋姓藏匿民间者,一经发现,往往按“图谋不轨”予以严惩。永安王宗室朱华塘,封镇国将军。顺治二年,豫亲王多铎兵临江南,华塘迎降,遂携清廷恩诏一纸赴湖广招抚,见族中宗室俱已投顺,思年老走动不便,在九华山出家。后外出化缘,至江西九江府被缉。华塘时年七十九岁,“衰病垂危”,清廷竟以“诈传亲王令旨”罪处绞。^③又山西缉获民人王师弟等隐匿明定安王三岁幼子大壮儿一案,地方官府定讞称:大壮儿以襁褓之子,虽难以“谋叛”之犯加之,然以王孙而奉旨解京,似与常犯不同,仍拟绞罪,庶蔽其辜。^④一直到福临亲政,对明宗室的打压才有所减轻。谕旨称:“自今以后,凡各省直有故明亲王、郡王流落地方者,该督、抚察其投诚实情,有无功次,并将伊家口起送来京,分别蓄养。”^⑤又宣布,其自镇国将军以下,不必起送,各照原籍编氓乐业,令其一体输税当差。此谕传布全国,有官员吹捧说:“此真千万世帝王敦大之仁”,“真同尧舜之仁”。^⑥这些谰辞未免肉麻,但也表明在对待流散明宗室问题上,福临的态度确比多尔袞有所缓和。

4. 镇压反乱。清廷入关,对明藩臣民传檄宣布“义师为尔复君父仇”,一时颇具迷惑性。一旦定鼎北京,南下征剿,与明朝共命运的诸藩多投奔南明政权。而在清廷统治区,不管皇太子或诸皇子生存与否,传闻却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各地汉民掀起抗清活动,动辄以明室宗裔相号召。而各地宗裔,怀有故国之思,又不堪清廷严酷镇压与迫害,不少人也卷入其中。顺治二年九月,“镇守庐凤等府固山额真准塔奏报,故明新昌王潜遁海岛云台山,聚众作乱,攻陷兴化县。官兵进剿,破其巢穴。斩首三千级。获新昌王于淮安,斩之”。^⑦江西原系明朝藩封之地,清军南下,“宗室逃匿甚多,诸逆逞乱者,每挟之以号召,动称为朱千岁”。^⑧明瑞昌王、麟伯王、霁伯王均寄身于当地抗清武装曹大镐营中。五年三月,河西回人米喇印拥立延长王朱识鏊起兵,甘、凉皆陷,渡河而东,连陷兰、岷、临洮,遂围巩昌,拥众十万,号称百万,关辐大震。旋败。^⑨八年,山东青州府故明宗裔聚众祭旗,“恣行不轨”。复有陕西降将王元、马德戕杀抚臣,议扶明庆王之孙。这些起事旋起旋扑,引起清廷高度警觉,不惜调集重兵,将起事扼杀于萌芽之初。

十年四月,偏沅巡抚金廷献奏报,查获故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,并文卷一箱,内载故明宗族

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26,顺治三年六月丁亥。

② 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97页;《登莱巡抚杨声远启本》,顺治三年七月十九日,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:《明清史料》丙编第三本,第282页。

③ 参见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05页。

④ 参见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94页。

⑤ 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15、117、119页。

⑥ 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19—121页。

⑦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20,顺治二年九月辛酉。

⑧ 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95页。

⑨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38,顺治五年五月辛未;魏源:《圣武记》卷7《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废绅往来书札。将由杞就彼处正法。^①十月,朱由极自称明光宗(泰昌帝)第三子,杨得先等推以为主。造割印,煽乡民,授官职,集党羽,潜谋不轨。为宛平县民宁忠弼举首,磔为首者七人,斩附从者二十二人。^②山西晋王驻太原府,城内宗室原有1200名,几乎被李自成军杀尽。^③晋王降清后,其下郡王、阳曲王世子朱慎𨮒、朱明𨮒参与抗清。慎𨮒被杀,明𨮒逃脱。次年,他从南明永历处潜归原籍,充任材官,暗地联络明宗室18人,“勾兵调将,散布谏[间]谍”,随身携带大明通宝、隆武通宝、永历通宝、弘光通宝为凭,传言“各处诸王宗室,俱相聚在永历处,络绎往来,各封名号,各处散布,各守信地,均有职掌”,事发处死。^④

明乐安王朱议漈,顺治初,隐姓埋名于南昌乡下。顺治五年,金声桓叛清,议漈复王号。及清军破南昌城,声桓死,议漈家眷90余口俱被杀戮,仅议漈逃出,削发为僧,称“三和尚”,一面行医度日,一面密谋起事,散发札付,鼓吹“恢复中原”。十一年,与僧人文秀、道士张应和等谋反事觉,在湖广孝感被获,处死。^⑤十二年,宗室朱以槩前已降清,谋叛,事泄处死。^⑥陕西平凉府捕获明宗室朱应龙等,应龙出家为道,改名王道真,扬言“恢复故业”“欲要寻访好汉”,散布札付,成员30余人,编为10派,各有字号。及被捕,只揖不跪。供述身世:本名慈𨮒,天启东宫太子,辛酉相,刘妃生,时年34岁。“当日教我的是翰林学士雷同,系江浙人,奶母宋氏。我皇叔崇祯坐了[皇位],将我曾囚禁冷宫,自李自成克陷北京,我孤身逃出游方,颂念经典”,辗转山东、山西、湖广、陕西、宁夏等地。^⑦王道真供述东宫太子细节甚详,非草野之人可以杜撰。清廷却以“诈称天启东宫”罪将其处死。

十三年,河南南阳府抓获朱存梧,自称“明朝王子”,意图中兴,因力单难成,欲结识好汉扶持。邀约武进士刘光进,密谋起事。^⑧十六年,明宗室朱义盛谋反,清廷杀其并同党舒瑛、张定之、李勇士、李赞美、谭武周、陈国辅、魏名观、徐介石。^⑨

以上,就是顺治年间故明宗室参与反清活动的一些片段。

不论昔日生活如何豪奢,地位如何荣光,随着大明王朝倾覆,这些宗裔贵胄均已沦落到社会底层。他们的特权被清廷剥夺,对满洲人的异族统治素怀家仇国恨,故不惜铤而走险,奋起抗争。在南明诸政权中,均有藩王宗裔加入,其中永历政权坚持时间最长,聚集明宗室最多。^⑩他们鼓吹“恢复故业”、“反清复明”,与汉人各阶层反抗清朝军事征服与暴力镇压的诉求高度契合。他们身份特殊,在民间拥有较大影响,往往是密谋起事的串联者、发动者,同时起着“反清复明”的象征作用。他们的参与,壮大了民间抗清斗争的声势,鼓舞了百姓斗志,对力撑残局的南明政权也是支持。同时应看到,这些明室宗藩,大多是生于深宫、长于阿保之手的纨绔子弟,不谙世事,庸碌无为,难堪重整河山的重任。他们的起事,多数在密谋阶段即告夭折,并不足以

①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74,顺治十年四月己未。

②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78,顺治十年十月丙戌。

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(顺治朝),第55页。

④ 参见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27页。

⑤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85,顺治十一年八月壬午;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22—125页。

⑥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92,顺治十二年六月壬戌。

⑦ 参见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29—132页。

⑧ 参见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53—154页。

⑨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127,顺治十六年七月戊辰。

⑩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(顺治朝),第432页。

构成对清廷的真正威胁。但即便如此,仍引起后者的残酷镇压,最终的结局是,“故明各王等,多被杀戮”。^①

二、康熙年间的民间反乱与“朱三太子”

顺治十五年底,长期盘踞西南地区的桂王逃入缅甸。不久,缅甸王献出桂王,为吴三桂所杀。此后,除南明将领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,满洲统治者基本实现对明朝疆域的征服,建立起清王朝统治。在此前后,各地“反清复明”斗争仍此起彼伏,且多以朱明嗣裔为旗号,其中影响最大的非“朱三太子”莫属。

康熙十二年(1673)十一月二十一日,吴三桂据云南反,檄文中斥清朝“窃我先庙神器,变我中国冠裳”。他自称“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、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、兴明讨虏大将军”,扬言将在甲寅年(1674)正月元旦,推奉三太子,“恭登大宝,建元周启”,^②吴三桂在起事之初打出“朱三太子”旗号,意在争取汉人各阶层的广泛支持。十二月二十一日,吴三桂反乱消息传至京师。次日,汉人杨起隆诈称“朱三太子”(朱慈瑞),谋于京师内外放火起事,建年号“广德”,联络旗下家人,称“中兴官兵”,头裹白布,身束红带。镶黄旗监生郎廷枢家人黄(黄吉)裁缝,正黄旗原承恩伯周全斌子周公直家人陈益(陈乙)等,参与起事。郎廷枢获知其事,拿获家人黄裁缝等四人首告。周公直亦呈首。正黄旗都统图海、祖永烈亲领官兵往围,斩十余人,当场起获吴三桂颁“平北大将军印”。

清兵广为搜捕,擒同党数百,磔于市。起隆逃去。随即有人举首,称他仍藏大城(京师北城,即八旗驻防城)内。清廷排兵城上,闭九门,严守城内栅栏,按册逐一排查,“城中不火食者三日,而各处火起者无数。白日昏黑,居人面皆土色”。缉获党羽既多,斩决无地,“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,尸积如山,如是者八日”。^③事件余波一直延续到翌年初。城中居民惊恐不安。清廷出谕安民,人心始定。

关于杨起隆一案逮捕人数,《平定三逆方略》稿本记为二千人,定本改为“数百余人”;法司审讯,受审者供出同犯人数,稿本记为“至数万”,定本改为“约有千人”。日本学者细谷良夫将清廷官修《方略》、朝鲜《李朝实录》、日本《华夷变态》详加比勘,认为清廷如是删改,主要是为了掩盖京城内发生大规模反乱的事实,^④从而说明:第一,杨起隆之变,并非孤立事件,与吴三桂反乱直接相关;第二,即便在清廷统治中心,“反清复明”口号仍有社会土壤,尤其满人家中汉人奴仆相约举事,实际是满汉矛盾在八旗内部的一次爆发。^⑤至于杨起隆下落,史书记载不

① 《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115页。

② 《吴三桂檄》,徐凯:《吴三桂讨清(檄文)原文本考》,《清史研究》2017年第3期;林春胜、林信篤编:《华夷变态》卷2,东洋文库,昭和三十三年(1958)本,第53—54页。

③ 佚名:《松下杂钞》卷上,孙毓修辑《涵芬楼秘笈》第三集,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。

④ 参见[日]细谷良夫:《吴三桂的叛乱和楊起隆、朱三太子之关系——以三藩之乱研究为中心》,朱诚如主编:《清史论集——庆贺王鍾翰教授九十华诞》,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。

⑤ 耶稣会士白晋记载说:“这些仆人都都是汉族出身。他们暗中策划在一夜之间把他们的满族主人全都杀掉,同时在北京城的四角放火,轻而易举地杀死可能从他们手中脱逃的满族主人。”([法]白晋著、赵晨译:《康熙皇帝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13页)佚名:《松下杂钞》卷上:“应熊遣人密约:凡京师满洲汉军之奴仆佃户,能杀其主者,即得其主之妻妾家当,能暗杀多人者,以差授职。”类似记载又见(清)陈康祺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3,清光绪刻本;(清)凌扬藻:《蠡勺编》卷19,清岭南遗书本;(清)黄鸿寿:《清史纪事本末》卷12,第106页。

一,有旋即就获,处以极刑;^①事后逃去,下落不明;^②化身道士,汉中纠党,康熙十九年被擒诸说。^③又一说,起隆押送京城后与妻马氏及旧部对质,并不相识,证实非本人,乃其同伙。^④后说载于清官修史书,可证清廷虽悬以重赏,起隆终隐没于民间。

康熙十七年,台湾郑锦部攻海澄。有“山寇”蔡寅,托名“朱三太子”,纠众数万,与郑军声气相通,克泉州,犯漳州,屡战皆胜。海澄公黄芳度与营总都巴败之于天宝山。^⑤次年秋,阿巴泰率军进湖南,于新化县僧寺俘明太子朱慈灿。慈灿诉已系崇祯帝长子,十二岁遭闯难出奔南京,福王朱由崧曾置诸狱,释为民,即往河南随朽木和尚为僧,流落江西、湖广二十余年,因病还俗。阿巴泰疏陈谏词:慈灿既自称真系明嗣,当械至京师辨识。至京,令与前系狱之朱慈瑞同党对质,俱不识,遂处斩。^⑥

四十六年,一念和尚复借“朱三太子”名义组织反清活动,建号“大明天德”,在浙江太仓起事。扬言“有朱三太子要复中原”,散发札付,许事成后做官。失败后逃至苏州被获。^⑦与此同时,在浙江又破获张廿一冒充“朱三太子”案。参与鞫审的江宁织造曹寅奏称:张廿一、张廿二,即江南获解之张君玉、张君锡;廿一妄称总爷,下有“二爷”、“将官”、“先生”(又称军师)、“先锋”等名目,“其所称朱三太子,不过借端煽惑,恐吓愚民”。按照曹寅的说法,一念和尚与张廿一并不相识,^⑧而两案几乎同时发生,且都发生在江浙一带,说明作为反清复明象征的“朱三太子”,在当地民间还有广泛影响。此前数年,浙江还破获有何子奋一案。何自称“朱三太子之次子”。

翌年四月,山东巡抚赵世显咨报,缉获改名王士元之朱三太子。自供:“我原姓朱,是明朝后裔,排行第四,叫慈焕,我二哥哥早死了,我与三哥哥同岁,自十岁上就离开了”;曾在民间隐姓教书,称“王老先生”。时年七十五,有六子一孙,除第三子已死,其余均被拿获。妻、妾、儿媳各一,女三,在官府严厉稽查下先已投缢自缢。^⑨六月,将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解至京城,由九卿会审。当时距清朝入关已60余年,是“朱三太子”在民间的最后一次现身。关于其身份真伪,他供系先朝皇四子朱慈焕,原封定王。审讯过程俱载清廷档案,且有同案重犯的回忆为佐证,故对其身份的真实性应无异议。尽管他否认参与一念和尚密谋不法事。但部覆命下,内

① 参见(清)陈康祺: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3;(清)凌扬藻:《蠡勺编》卷19。

② 参见(清)顾炎武:《顾亭林先生诗笺注》卷15,清光绪二十三年徐氏味静斋刻本。

③ 参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91,康熙十九年九月戊寅;郑虎文《吞松阁集》卷23,清嘉庆刻本;吴振棫:《养吉斋丛录》附载《养吉斋余录》卷4,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309页。

④ 参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93,康熙十九年十一月乙酉;清国史馆撰:《清史列传》卷2《阿巴泰传》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1册,第91页。

⑤ 参见《清史稿》卷261,中华书局1976年版,第9981—9982页;彭孙贻:《靖海志》卷4(清钞本)误将蔡寅记为朱寅,起事时间系于前一年。

⑥ 参见清国史馆撰:《清史列传》卷2《阿巴泰传》,第1册,第91页;康熙帝获知擒获伪太子朱慈灿消息后,当即表示怀疑,据说他曾将此事询问在内旧太监,答云:“彼时慈灿年甚小,必不能逸出”,又认为“历年已久,至今始出,自然近伪”,但为慎重起见,他还是谕令“事迹未明,不得即在军前完结”,而是携回京师鞫审定夺,见《康熙起居注》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记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474页。

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558、582页。又一说,此前一念和尚已歿,他原籍金陵上元,世承指挥使。中年以甲申之变,祝发南岳,栖新宁放生阁近三十载。圆寂于庚戌年(康熙九年),年七十五。“康熙中屡兴大狱,株连甚广,而不知一念实有其人,唯已早死。度其人必有过人之才,好为人假以号召。”(邓之诚:《骨董琐记全编》,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,第595页)

⑧ 参见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》第六十八:《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折》(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开渠折内),中华书局1975年版;第七十二:《曹寅奏报朱三太子在鲁获解折》,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。

⑨ 参见《朱三太子案》,故宫博物院编:《史料旬刊》第2期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,第77页。

有“朱某虽无谋反之事,未尝无谋反之心,应拟大辟,以息乱阶”之判语。^①虽认定他未卷入谋反,仍拟死罪。待九卿复奏,称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七年前身故,传唤明代老太监俱不识,明系假冒,“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”。得旨允行。^②慈焕自供系皇四子,清修明史却指其为第五子,欲盖弥彰,显然是为杀戮之行回护。孟森曾一针见血指出:“以前朝皇子非罪名,务令以假冒为罪。”^③如果说顺治初年,清朝天下未定,摄政王杀故明太子,尚有维持大局的考量。那么六十余年后,当清廷江山已稳,仍执意处死七十五岁高龄的皇四子,则量刑未免过苛。此后,民间反乱虽仍有以“朱三太子”名义发动者,均系假托。

有学者统计:自顺治十三年以迄乾隆十七年(1752),打着“朱三太子”旗号或借朱明后裔名义进行“反清复明”活动的事件共有16起;其中,表明“朱三太子”身份的8起,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五十年以前,事发地包括山西、云南、京师、福建、浙江、陕西、江苏、广东。^④以上只是概括统计,数字未必准确,但可知“朱三太子”在民间影响之广,号召力之强。

吴三桂起兵初,曾打出“朱三太子”旗号。及其事衰,有故明少卿李长祥建言他“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,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”。三桂以其言问谋士方光琛,答曰:“昔项羽立义帝,后又弑之,反动天下之兵。今天下在王掌握,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?”自此三桂不再言复明。^⑤其后复有劝其复故明年号、立明后裔者。而谋士胡国柱谏曰:“大湖南北每袭故明旗号,迄无一成,盖历数已绝故也。”^⑥三桂欲借帝号以自重,遂在群臣劝进下撕去假托胜朝“朱三太子”的伪装,借“周朝八百今重说”之谚,以国号“周”号召天下。后来的事态表明,明室宗裔在汉人各阶层中的影响,虽呈逐渐衰颓趋势,远比吴三桂及其谋臣估计的深远。

康熙六十年五月,台湾民朱一贵起事,自以朱姓,伪称明裔,攻占府城,称“中兴王下大元帅”。兵败被俘,至京师杀害。总之,终康熙一朝,汉人民间打着“朱三太子”名号反清者尤多。康熙帝曾说过“匪类称朱三者甚多”的话,^⑦雍正帝亦追述称:“从前康熙年间,各处奸徒窃发,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,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,指不胜数屈。”^⑧由此可见,“朱三太子”作为反清象征,在民间广有影响,因此胤禛才会发出“指不胜数屈”的感慨。

雍正年间,打着明室旗号的起事仍史不绝书,并且不再局限于“朱三太子”一身。雍正初年,山东曹州民伪称“朱六太子”,“挟妖术惑愚民”,^⑨清廷密令捕送京师。六年,浙江有张云如朱明王朝后裔案。雍正七年,胤禛说:“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,假称朱姓,托于明之后裔,遇星士推算,有帝王之命。以此希冀鼓惑愚民,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。”^⑩其假冒者被捕于京城,可知对清廷而言,辇毂之下也不能没有隐忧。八年四月,四川忠州府有杨成勋“捏造妖谣,

① 参见魏声猷:《鸡林旧闻录》(附《吉林地志》),吉长日报社1912年版,第12页下。

② 参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5,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丁未。

③ 孟森:《明烈皇殉国后纪》,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上册,第68页。关于朱三太子真名,记载歧互,如慈炯、慈焕、慈瑞、慈灿,孟森考订为慈灿(第63页)。

④ [韩]李平秀:《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》,《清代满汉关系研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,第384—385页。

⑤ 参见(清)孙旭:《平吴录》,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辛巳丛编本。

⑥ (清)刘健:《庭闻录》卷5《称兵灭族》,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三编第26辑。

⑦ 参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3,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乙丑。

⑧ (清)胤禛:《大义觉迷录》卷1,清雍正内府刻本,第6页上。

⑨ 《清史稿》卷292,第10308页。

⑩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86,雍正七年九月癸未。

吹角啸聚”案。官府搜出诉状怨白等稿,言词虽鄙俚不经,其中引清丈苛虐以为言。^①同年,广东有李梅“朱三太子”案;十年,福建台湾府有吴福生大明招讨大将军案;十二年,台湾诸罗又有民人无齿甫等,将写有“大明朱四太子”、“大明复兴朱四太子三国公起义”等旗帜插于北门外田中,意图“招人为匪”,引起官府惶恐。^②

雍正年间,清廷入主中原已八九十年,经过康熙年间休养生息,全国城乡经济繁荣,社会稳定。满洲统治者治国,一向以儒家文化为本,并采取弘扬理学、振兴文教、蠲免钱粮、赈济灾荒、清理刑讼、恩诏赦免、延揽名士、纂修明史等一系列措施,逐渐拉近了与汉人各阶层的心理距离。此消彼长,随着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逐渐深入人心,并为全国臣民所普遍接受,假冒朱氏“太子”相号召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在民间虽时有发生,但在起事规模、起事频率,乃至影响范围和力度方面均已大逊于以往。所谓燭火余烬,时有复燃而已。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,社会中的满汉矛盾虽不可能完全消弭,却有明显缓解。

三、乾嘉年间的民间反乱与伪托“牛八”现象

乾嘉年间,清朝统治盛极一时,但社会矛盾也在积聚。与前不同的是,这一时期的民间反乱,规模小、人数少,且多以宗教组织为依托。这些组织多系明代民间宗教的延续,其教派名称、信仰内容、组织结构与明代大体相同。包括白莲教、罗教、弘阳教、三阳教、大乘教、闻香教、八卦教等,以及从中衍生的诸多支派。教派名目庞杂,教义大同小异。其中带有“反清复明”色彩的教派首领,有自称“牛八”或伪托“牛八”者。“牛八”两字合成为一“朱”字。教派首领以如此含蓄的方式,向教徒表明自己的胜朝嫡裔身份,藉以彰显秘密活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,达到凝聚人心之目的。

白莲教衍生出的无为教,祖师张保太,又作张宝泰,云南景东府贡生,康熙二十余年,在云南大理创无为教,自称四十九代收圆祖师。乾隆六年被捕,死于狱中。无为教的后继者强调教义中弥勒下凡管天下的说法,宣称李开花(即苏君贤)是皇帝。四川有所谓铁船教,其教首亦自称牛八。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谕:牛八掌教弥勒转世之语,现经福宁搜出邪经,系起自前明正德四年(1509),且乾隆二十二年、三十三年,河南、贵州所办邪教,已有牛祖、八牛[牛八]名目,自系奸人捏造。^③以牛八影射朱字,说明牛八一字,暗喻朱明,并非确有其人。

至于“李开花是皇帝”谶言,在民间早有流行。其说最早流传于陕西,与明末李自成起事有关。明亡后,继续流传。雍正五年(1727)七月,山西泽州发生“妖言聚众案”。首谋翟斌如,通法术,借谈堪輿星命,妄号“神仙”。他拜陕西郃阳潘道人为师。后者宣称,“欲于陕西辅佐李开花举事”。^④陕西曾有传言,说李开花(化)又名李九桃,原属无稽之谈。翟斌如还与山西长子县白莲教头目张冉公(张进斗)、靳广联系,意图起事,终以谋泄被杀。李开花是谶言中的理想君主,每一个意图和朝廷对抗自立为帝的人,都可应谶自称李开花。清廷四处追捕捉拿李开

① 参见《清世宗实录》卷93,雍正八年四月甲辰。

② 参见《台湾诸罗县奸民插旗案》,故宫博物院编:《史料旬刊》第9期,第1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,第683页。

③ 参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462,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壬戌。

④ 《山西泽州妖言聚众案》,故宫博物院编:《史料旬刊》第9期,第1册,第630页。

花,反而愈捉愈多。^①但具体就这些供奉“李开花”的民间教首而言,其是否具有清晰的反清意识,则应具体分析,不可一概而论。

清茶教(又称大乘教、白阳教)是白莲教主要支派之一,由闻香教主王森子孙所创。王森,明万历顺天府蓟州人,后住直隶滦州石佛口,自称得妖狐异香,倡白莲教,自称闻香教主。信奉无生老母,宣传大乘教。旋被捕,毙于狱中。其子王好贤,与徒弟巨野徐鸿儒,踵其教义,徒党益众。天启二年(1622),筹谋起事,鸿儒自号中兴福烈帝,建元大乘兴胜,兴兵陷郛城,不久失败。鸿儒被擒,磔于京师,临刑前叹道:“我与王氏父子经营天下二十余年,按籍而数,吾法门弟子已逾二百万。”^②足见其教在民间影响的广泛。

清顺治三年六月,汉官林启龙奏:近日风俗大坏,异端蜂起,有白莲、大成、混元、无为等教,以烧香礼忏,煽惑人心。应行严捕,处以重罪,以为杜渐防微之计。从之。^③十三年,又禁白莲、闻香等教。雍正年间,王森第四代孙王敏迪,以传教被捕。乾隆中,湖北襄阳等地发现白阳斋教,教首王忠顺(王亨功),乃王森七世孙。忠顺被清廷处死,子殿魁继续在江南淮安、江宁、泗州等处传教。自明万历迄清嘉庆二百余年,王氏已阅十辈,屡经破案,其子孙仍不弃不舍,前赴后继。为逃避官府追捕,改名清茶教,口传三皈五戒,为人供茶治病。入教者互称“爷”,“磕头礼拜俨若主臣”。故清廷定性,此教“潜蓄异谋实为各项邪教首恶”。教徒辗转传习,流布数省。嘉庆末年,教徒相继被官府捕获。起获《三教应劫总观通书》,宣传三劫说和天盘三副说,即过去燃灯佛掌天盘,九劫;现在释迦佛掌天盘,十八劫;未来弥勒佛掌天盘,八十一劫。未来佛即弥勒佛,将降于石佛口王姓家内。^④教首借此引诱教徒缴纳“根基钱”,许愿“将来即为元勋钱”,宣扬将来弥勒佛出世,共享荣华。书中“反清复明”思想昭然若揭:“清朝以[已]尽,四正文佛落在王门。胡人尽,何人登基;日月复来属大明,牛八元[原]来是土星。”^⑤“王门”指教首王氏子孙。“反清”与“复明”互为表里,是斗争目的,“胡人”则是对满洲人贬词。说明清茶教以“复明”作为动员汉人的思想工具。如此明确的“反满”、“反清”内容,在民间教派中并不多见。

清代中期,作为白莲教支派的混元教在京畿、直隶、河南等地趋于活跃。教徒烧香拜佛、念经敛钱,为人治病。乾隆四十年,清廷查出河南鹿邑混元教首樊明德,所传《混元点化》一书,内有“换乾坤、换世界、反乱年、末结[劫]年”等语,^⑥说明该派教义亦寓“反清”思想。樊明德被杀,弟子王怀玉逃脱。王怀玉弟子河南鹿邑人刘松,被遣戍甘肃隆德。刘松曾收安徽太和人刘之协为徒,后刘之协至隆德探视刘松,商量将混元教改称三阳教,将“混元点化经”改称“三阳了道经”,推刘松为“老教主”。为招诱乡民入教,“觅一人捏名牛八,凑成朱字,伪称明朝嫡派”,又指刘松养子喜儿(四儿)为“弥勒佛转世,将来保辅牛八”,扬言入教者可免刀兵水火一切灾厄。刘之协复吸取收元教首湖北襄阳人宋之清为徒。

收元教也宣扬弥勒佛转世和入教避劫说。数年间,宋之清收徒愈多,散布于湖北、陕西、四

① 参见喻松青:《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② 《明史》卷257,第6622—6623页;沈国元:《两朝从信录》卷21,明崇祯刻本。

③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26,顺治三年六月丙戌。

④ 参见《王殿魁供词》、《王兴建供词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48、49页;(清)那彦成:《那文毅公奏议》(初任直隶总督奏议)卷42,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大臣字,清道光十四年刻本。

⑤ 《谕那彦成将石佛口王姓为首传教者照律问拟》,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3辑,第36页。

⑥ 参见《徐绩奏审讯混元教教首樊明德等情形折》,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二日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9辑,中华书局2003年版,第165—166页。

川、河南数省。他不肯将敛得银钱与刘之协分用，遂自立西天大乘教，称将有五魔下降，水火灾劫，必须尊奉弥勒佛，烧香念经，方能躲避。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弥勒佛转世，立其子卯儿(卯金刀)为“牛八”。^①同时，原收元教四川房县人王应琥(原籍湖北监利)及其师傅艾秀，为招诱信众，亦散布“弥勒佛转生河南无影山张家，扶助‘牛八’即朱姓起事”。^②

对于民间此类活动，清廷一向保持高度警惕，一旦发现，严惩不贷，反复搜捕，不留余孽，但是却难以杜绝其蔓延。先是，河南新野人廖日洲从枣阳人杨太习白莲教，杨太故后，他又从汝阳人方手印习牛八教。以后，方手印、廖日洲到襄阳传教，编有咒语，“以致愚民多有附和入教”。襄阳教民以武金卓等为骨干，“习牛八教，又名挥手教，烧香磕头，传有咒语八句。”教首廖日洲宣传说，“凡习牛八教出根基钱的，将来都有好处”，命武金卓出钱八千文，其余教徒或千文、或数百文。教首称掌柜，下有管账，负责保管银钱。牛八教的活动自乾隆末年沿续到嘉庆二十一年(1816)，待襄阳武金卓等案发，清廷在湖北、河南等地再次兴起教案。^③

乾嘉之际，以上各教首，相继被清廷缉捕处死，惟刘之协逃脱。之协逃脱后，继续以“弥勒佛转世，保辅牛八”为号召，在皖、豫、鄂、陕、川等省布教传徒，这成为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事之嚆矢。白莲教教义以祷告及念咒可以治病，号召徒党。关于起事缘起，《清史稿》卷三四四载称：乾隆年间，刘松以习混元教遣戍甘肃，复倡白莲教，与其党密谋在湖北、陕西、四川等地起事。清廷捕杀刘松，而徒党刘之协、宋之清传教于河南、安徽。以鹿邑人王发生诡称明裔朱姓，煽动民间，事觉被捕。王发生以童幼免死，遣戍新疆。刘之协远颺不获，各省大索，官吏奉行不善，颇为民扰。^④上引记载有3点不确：(1)白莲教起事，并非刘松一人发起、领导、组织，而是由刘松、刘之协领导三阳教、宋之清领导西天大乘教、王应琥领导收元教等三教派合力进行；(2)刘松、刘之协并未以河南鹿邑王发生诡称“明裔朱姓”，而是以王发生堂侄王双喜为“牛八”。^⑤(3)刘之协“远颺”之说不确。他潜匿河南邓州新野数年后，被捕押解京师，定罪名“白莲总教首”，凌迟处死。^⑥

嘉庆元年(1796)，白莲教起义爆发，迅速席卷川、鄂、陕、豫、甘五省，形成清代第一次大规模民间反乱。清廷遣将征剿，前后十历寒暑，耗费国帑以亿两计。起事者居无定所，行迹飘忽不定。清军顾此失彼，疲于奔驰，数千里内之黎民百姓皆被蹂躏荼毒。故彼时有：“贼似梳，兵如篦，兵贼过后无余粒”；“贼至兵无影，兵至贼无踪；可怜兵与贼，何日得相逢”等谣。^⑦白莲教首领王三槐等被俘廷讯，皆以“官逼民反”为词。^⑧这正是酿成大规模民变且旷日持久的原因。

① 《勒保奏审明刘松等倡教传徒情形折》，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初六日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：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9辑，第202—203页；《兵部为审明襄阳县民宋之清等倡立邪教事》，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，台湾中研院藏《内阁大库档》，登录号：182651—001。

② 《兵部为审明襄阳县民宋之清等倡立邪教事》，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，台湾中研院藏《内阁大库档》，登录号：182651—001。

③ 参见(清)孙玉庭等：《拿获牛八教匪犯武金卓解豫质讯由》，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：《军机处档折件》，第049152号；(清)孙玉庭：《奏报将访获传习牛八教犯方有梅等解赴河南质办情形》，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：《军机处档折件》，第049627号；(清)阮元：《奏报审办襄阳牛八教邵元胜等案完竣》，嘉庆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：《军机处档折件》，第051512号。

④ 参见《清史稿》卷344，第11139—11140页。

⑤ 《乾隆末年白莲教秘密反清斗争·编者前言》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：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9辑，第157页。

⑥ 参见(清)庆桂等撰：《剿平三省邪匪方略》正编卷198，清嘉庆十五年武英殿刻本。

⑦ 参见(清)奕赓：《佳梦轩丛著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113页。

⑧ 参见《清仁宗实录》卷38，嘉庆四年正月己卯。

其中,白莲教的宣传鼓动,也起到一定作用。

八卦教与历史上活跃于京畿一带的红阳教(弘阳教)有关系,主要活动于华北地区。其中若干教派有反清倾向,如震卦王中一派,又称清水教。乾隆三十九年,山东寿张清水教徒王伦组织起事,攻打寿张、堂邑、阳谷三县,抢劫库银,戕害官吏。方据临清旧城夺新城,清军大集,擒伦于城中。

王伦起事失败,八卦教在北方农村继续秘密传布,主要活动于鲁、豫、直三省。教中按八卦分派,以坎、震、离三支最强。嘉庆十八年,在京畿发动天理教起事的林清出于坎卦教;另一首领李文成,则属震卦教。^①林清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,习教之人遂各深信。十八年七月十八日,嘉庆帝东巡启鑾,秋猕并谒东陵。李文成、林清决策于九月十五日在京师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同时起事。但事机泄露,九月初,李文成在滑县被捕。九月七日,冯克善带领教徒进攻滑县,救出李文成,华北十几个州县徒众提前起事响应。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军帐,树大纛,自号“大明天顺李真主”。^②“大明天顺”是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年号。明英宗朱祁镇1436年即位,年号正统。十四年(1449),土木堡之变,为蒙古瓦剌俘,弟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,遥尊英宗为太上皇,改元景泰。瓦剌遂释英宗,景泰帝软禁其于南宫。景泰八年(1457),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,英宗复位称帝,改元天顺。李文成打出“大明天顺”旗号,除表明坚守“反清复明”的传统,与“夺门之变”(即夺取紫禁城)的暗喻或有一定关系。

九月十四日,林清集徒党数千人,在京城举事。分为二队,在大内太监引领下自东华门、西华门攻入紫禁城。他们从腰间掣出白旗摇展,或书“大明天顺”,或书“顺天保民”,^③与清廷护军在隆宗门等处展开激战。至十七日,攻入紫禁城教徒及引路太监均被击毙或捕获。林清、李文成相继死,起事失败。

天地会在闽、广间流传已久,具有“反清复明”的传统。凡入会者要对天跪地立誓,故此取名天地会。其结会有十几人为一伙,也有数十人为一伙,各为党羽。如遇素不相识之人,问及有无兄弟,答以左右俱有兄弟,并将三指向心坎一按,便知是同会,大家彼此应照。^④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事,即有天地会背景。此后,天地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内地和海外华人世界。关于其缘起,说法不同,一说康熙年间。传说称:康熙帝平西鲁(西域厄鲁特),深得少林寺僧之助,其后帝信谗言,火烧少林寺,寺僧大部死,仅五位幸存,即五祖。五祖避清军追捕,遇朱明后裔洪英、僧万云龙和其他兄弟,为“反清复明”组织洪门,即天地会。后与清军作战失败,五祖分散各地设立五房,伺机再起。在天地会起源传说中,为复兴朱明王朝必不可少的人物是崇祯帝嗣裔朱洪英。朱洪英是虚构人物,与以往民间起事中的“朱三太子”或朱明嗣裔如出一辙,都是复兴朱明王朝的象征人物。虽为虚拟,却为民间反抗活动的重要精神动力。^⑤

① 参见喻松青:《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② 参见(清)蒋湘南:《七经楼文钞》卷5,同治八年马氏家塾刻本;(清)那彦成:《那文毅公奏议》(总统河南山东直隶军务奏议)卷30,清道光十四年刻本;(清)托津:《平定教匪纪略》卷首,清嘉庆武英殿刻本。

③ 参见(清)昭桂:《嘯亭杂录》卷6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63页。

④ 参见闽浙总督等咨呈,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,《内务府来文》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: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下册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812页;闽浙总督李侍尧奏,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,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: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下册,第717页。

⑤ 参见[韩]李平秀:《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》,《清代满汉关系研究》,第386—387页。此外清末有郑成功创会说,参见周育民:《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——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》,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1期。

乾嘉年间,因满汉民族矛盾总体趋缓,民间反乱真正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宗旨者为数寥寥。这类活动,一般披着民间宗教的外衣。有些教首借助“牛八”的隐讳表述,曲折传递“反清复明”的信息,但民族意识模糊,与底层民众的诉求基本脱节。其活动的真实目的,“不过为愚哄众人,希图多得钱财”。^①说明这一时期民间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总体呈日愈衰微的状态。

四、晚清时期的反清斗争与“反清复明”口号的终结

清中叶以降,满汉关系虽逐渐陶融,但造成民族矛盾的根本症结——民族歧视——并未消弭。“首崇满洲”,是满洲诸帝恪守的国策;以爱新觉罗皇族为核心的满洲权贵掌控军政大权,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,更是清朝 268 年统治的基本事实。这就决定了,满汉矛盾是贯穿清朝统治始终的一条基本线索。而区别则在于,当清朝鼎盛时,此一矛盾若隐若现,基本处于蛰伏状态。一旦王朝统治盛极而衰,内忧外患纷至沓来,官贪吏蠹变本加厉,满汉矛盾重新激化。与此同时,民间久已衰微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亦呈某种程度的“回光返照”迹象。在晚清时期形形色色的民间反乱中,明确提出“反清”、“反满”口号,伪托明室宗裔,并且产生广泛社会影响者,首推太平天国。

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,广东花县人,生于耕读之家,熟读四书五经。自童年起即揣摩制艺,应试科举,但屡考屡挫。三十一岁(道光二十三年,1843 年)再次应试,仍名落孙山。受此打击,重病一场。同时,目睹清朝统治腐朽,对外丧权辱国,萌生造反思想。他附会此前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布道书《劝世良言》,结合自己病中幻象,扬言自己曾上天堂接受上帝旨意,下凡救世,斩妖除魔,除去世间不平。随即创立“拜上帝会”,通过传教组织发动群众。

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(1851 年 1 月 11 日),洪秀全聚集在桂平金田村的太平军,宣布起义。翌年二月,他在武宣东乡正式建国号“太平天国”,自称“天王”,登极即位。洪秀全为发动群众,主要采取创“拜上帝教”、否定儒教、捣毁民间偶像、易服蓄发,恢复汉人服饰等措施。同时,沿用民间反乱者一贯做法,伪称自己是“大明太祖之后裔,弘光皇帝七世孙”(还有伪称“前明泰昌七世孙”、“桂王第三子之裔”等说法);^②宣布加入上帝会者,“以恢复明室为志”。

在民间反清斗争中,太平天国无疑是彰显“反满”动机最著、态度最坚决者。太平军入湘鄂,陆续发布文告,以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《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》,将讨伐对象直指满洲最高统治者:“今满妖咸丰,原属胡奴,乃我中国世仇。”^③在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中,以犀利的语言,控诉满洲统治者压迫汉人的罪恶,包括强迫薙发留辮,改变中国(实为汉人)衣冠,淫乱中国女子(即满汉通婚),改变中国制度,使用“胡言胡语”(即满语满文)等。^④

对太平天国的发动者而言,民族压迫的历史记忆根深蒂固并非偶然。清初满洲统治者逼

① 陕甘总督勒保奏,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,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: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下册,第 824 页。

② 参见陈迺勋、杜福堃编:《新嘉坡乘》,南京出版社 2014 年版,第 170 页;《湘绮楼日记》,光绪二年三月初五日,李慈铭:《越缦堂日记补》第 1 册第 7 页,引自陈登原:《国史旧闻》第 4 分册,中华书局 2000 年版,第 99 页。又,《清史稿》卷 475《洪秀全传》载称:“既破金陵,遂建伪都,拥精兵六十余万,群上颂称为明代后嗣。首谒明太祖陵,举行祀典,其祝词曰:‘不孝子孙洪秀全,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,登极南京,一遵洪武元年祖制’。”都反映洪秀全起事初假称“明室宗裔”的事实。

③ (清)杨秀清、萧朝贵:《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》,罗尔纲编著:《太平天国文选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,第 73 页。

④ 参见(清)杨秀清、萧朝贵: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,罗尔纲编著:《太平天国文选》,第 77—78 页。

令汉人剃发编辫,改变衣冠,是最令汉人痛心疾首之事。南方汉人一再掀起抗清起事,前赴后继,可歌可泣,其事迹在后世口碑相传。洪秀全家乡广东花县花山一带,是南明抗清最后基地之一。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析南海、番禺二县之地置花县,并因花山得名。两广又是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宗旨的天地会(三合会)长期活跃地区。对于太平天国“反满”檄文的发布,不能不考虑上述社会历史背景。^①

同时还应看到,在太平天国强烈“反满”宣传中,确有天地会的影响。在太平天国首领之一“天德王”洪大全的《自述》中称: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,先曾往来两广,结拜“无赖”,设立天地会名目。^②“无赖”是统治者对反乱者的惯用之词。说明洪、冯等人曾借天地会名义在民间开展串联,故而清廷亦斥其“藉添弟会[天地会]名目裹胁贼匪,到处抢掠财物,屡与官兵打仗”。^③有学者曾认为: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,实即天地会支派。洪在永安时,分封五王,自己但称太平王,似乎尚不敢违背天地会据山为王,共扶大明之旨。其次,应与积极拉拢两广地区天地会派的动机有关。太平军攻入湖南,檄文诏书,犹大申“反清复明”之旨,于“天父”、“天兄”诸语则竭力避免之。故天地会各派归之者至于五六万人。但洪秀全进取长沙后,得玉玺,称天王,天地会人渐与之脱离。盖此种做法与恢复明室之旨大有冲突。故此后天地会人反有加入曾、胡军队而与太平军决战者。^④

太平天国在统治区内,宣布废除满洲统治者强加在汉人头上的发型服制:衣服,便帽去顶,袍去马蹄袖。纬帽外套马褂袴套,不准穿戴。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,不准薙发。^⑤这表明,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,不是单纯的政治策略、政治口号,而是一场席卷千百万民众的社会实践。太平天国领导者希望通过号召“反满”,推动反清大业,争取汉人各阶层广泛支持。应该说,这一政治目的,随着太平军胜利进军,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。

但洪秀全在定都金陵(江宁)初,明确放弃“复明”主张。他评论天地会说:“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,但常闻其宗旨在‘反清复明’。此种主张,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,果然不错的;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,我们可以仍说反清,但不可再说复明了……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,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。”^⑥洪秀全认为天地会创于康熙年间,宣布“反清复明”是二百年前旧事,早已过时。他宣布放弃“复明”,是基于政治考虑。建立太平天国取代腐朽清王朝,显然比鼓吹“复明”,对汉人社会更具号召力。由此可见,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,在识见上确比以往民间会党高出一筹。仅凭这一点,似乎预示着其事业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。然而如众所知,后来的历史进程导出的却是另外一种结局:洪秀全在金陵称帝后,妄自尊大,一意孤行,终将太平天国引向覆灭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后,天地会在各地发动多次起事,仍时时打出故明旗号。咸丰三年(1853)四月,闽南爆发天地会(双刀会)黄德美、黄威(位)起事,聚众万人,连克海澄、漳州、同安、厦门、漳浦,黄威自称“汉大明统兵大元帅”,年号“天德”,布告反清。台湾天地会李石亦举事,占凤

① 参见姜涛:《关于太平天国的“反满”问题》,《清代满汉关系研究》,第409页。

② 参见《洪大泉自述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太平天国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777页。

③ 《洪大泉自述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太平天国》,第779页。

④ 参见毛以亨:《太平天国与天地会》,《申报月刊》第4卷1期,引自陈登原《国史旧闻》第4分册,第97—98页。

⑤ 参见《天王即位告天下诏》,陈迺勋、杜福堃编:《新嘉坡》,第172页。

⑥ (清)洪仁玕述、韩山文著、简又文译: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,杨家骆主编:《太平天国文献汇编》第5册,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,第872页。

山,以“兴汉灭满”为号召。同年八月,天地会支派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发动起事,占上海县城,杀知县袁祖德,俘苏松太道吴健彰。刘丽川为安定民心,以“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”名义发布告示,声称“方今童君昏瞶,贪官污吏,布满当朝。鞑夷当灭,明复当兴。”^①称“大明国”,年号“天运”。小刀会所奉宗教,与太平天国互异,且许吸食鸦片,故太平军鄙视之。后来,刘丽川尊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为“主上”,自称“臣”,取消大明国号,改奉太平天国年号和制度。刘丽川占据上海,首尾十七个月。

咸丰四年,广州府天地会(三合会)总会首陈松,与属下会首何六、陈开、李文茂、陈显良等联合,为实现“反清复明”目的,发动武装起事,宣布“兴汉灭满”。会众分三路围攻广州。清军得英军之助击退进攻。随即,陈开、李文茂率余部入广西,克浔州府城,建大成国。陈开自为国王称“平浔王”、李文茂封“平靖王”。七年,占柳州,改柳州为龙城府,建王府,设官分职。十一年,清军围攻浔州。陈开兵败,被俘处死。^②上述事实说明,迟至晚清,至少在南方一些地方,汉人王朝的“明”,作为与满人王朝“清”对立的政治象征,在底层民众中仍具有一定影响。

光宣之际,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形成,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,如萍浏醴起义、潮州黄冈起义、惠州七女湖起义、防城起义、镇南关起义、钦州起义、河口起义、安庆起义、广州起义。同时,民间会党打着朱明宗裔旗号发起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犹如强弩之末,仍未绝迹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洪全福(春魁)密谋起事,与梁慕光联络会党,在香港、广州等处设立秘密据点,组织军队,筹运军装机械,印制《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讨清告示》,计划于十二月三十日夜起事,攻占广州。因事机不密,被湖广总督德寿访闻,会党多人被捕,洪全福被杀,起事失败。^③辛亥年(1911),鄂军起义,兴国人朱滨偕同党军数千,自称朱洪武之后,自立为王,并出大总统印;后为防军擒拿。^④至此,以朱明宗裔为旗号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由盛而衰,在持续二百余年后,终于随着其对立面清王朝的倾颓而画上句号。

一个明显变化是,此一时期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,在传统口号的包装下实际已注入全新的内容。如洪全福起事,声明:“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,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。天下平后,即立定年限,由人民公举贤能总统。”^⑤在宣扬反抗清廷民族压迫的同时,鼓吹西方民主制,提倡民选总统,反映了西方民主思潮与制度对清末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。

五、结 语

综上所述,可将全文要点概括如下:

1. 清朝入关初,“反清复明”是汉人社会最有力的动员口号。无论“太子”、“朱三太子”是否真伪,实为民间“思明裔之一种公名”,^⑥即民间反清斗争的重要象征。从“皇太子”、“朱三太

① 《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示》(天运元年八月初五日),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料研究所编:《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,第4页。

② 参见《安睦百姓告示》(咸丰三年),《广东洪兵起义史料》上册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,第53页。

③ 参见《洪全福起事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1辑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142页。

④ 参见金城:《湘汉百事》卷上,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初编第53辑。

⑤ 《洪全福纪律告示》,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1辑,第143—144页。

⑥ 孟森:《明烈皇殉国后纪》,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上册,第60页;又称:“朱三太子为当时江湖拥戴之名,固不问其已故之人与否,但有烈皇之子见在,即以朱三太子奉之。”(第66页)。

子”、“牛八”的频频现身,再到伪托明裔发起反乱,实际呈现了有清近三百年间,汉人各阶层反抗清廷政治压迫、民族压迫的一条重要轨迹。

2. 清代民间“反清复明”斗争,始终离不开以明室宗裔相号召,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关系。雍正《大义觉迷录》卷一曾感慨此种现象之披靡远超前代:“从来异姓先后继统,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,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。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,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。”^①胤禛此话,只道出此种现象以本朝为烈,却未揭明掩藏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。而关键原因就在于:清朝作为少数族人所建王朝,其对汉民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,尤其清兵南下征服中使用大规模暴力,不能不在汉人各阶层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,并激起他们长久和坚韧的反抗。这就构成汉人社会“反清复明”诉求的坚实基础。与此同时,汉人社会根深蒂固的中原王朝“正统观”,儒家“华夷之辨”思想等,也助推了此一政治诉求的传播与传承。

3. 清代民间“反清复明”活动席卷地域广,持续时间长,由盛而衰,具有阶段性特点。顺治年间,清兵南下,暴力征服,民族矛盾空前激化。“反清复明”成为汉人各阶层最集中的政治诉求,这一斗争此起彼伏,如火如荼,明室嗣裔是汉人反抗的重要象征。康熙年间,清朝统治秩序建立,经济繁兴,民族矛盾趋于缓和,民间“反清复明”活动渐失动力。伪托明裔现象虽时有发生,但起事规模缩小,影响有限。乾嘉年间,清朝实现空前“大一统”,满汉矛盾进一步缓和,但清政权盛极而衰,官贪吏蠹现象明显滋长,贫富对立冲突也在加剧。这一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反乱(如川楚陕白莲教起事)的基本背景是“官逼民反”。起事者的基本诉求是反贪官不反皇帝,即使有反官府行为,也缺乏明确反清意识,更遑论专门针对民族压迫的口号。毕竟,对于底层民众而言,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官府贪黷,民不聊生,而非民族压迫。

道光以降,清王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,为汉人社会的反清反满斗争重新注入了活力。崛起于广西山区的太平天国,秉持“反清”、“反满”双重目标,在民间反抗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。“反清”与“反满”,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口号。前者针对国家政权,后者针对统治民族。迨至清末,几乎所有民间会党或组织,无论新旧,均扬起“反清”、“反满”的旗帜。与此同时,“反清复明”的口号虽时有显现,实际影响却极其有限。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,斗争的焦点随之转移。关键点变化是:随着西方民族观与民主观在海内外汉人精英中的传播,将推翻清朝统治(即所谓“反清”)与重建汉人帝制(具体表现为“复明”)相熔接的传统诉求明显落伍,远不足以发动广大民众投身一场大规模战斗。而当时的革命党人,无论是章炳麟“改制同族,谓之革命;驱逐异族,谓之光复”观点,还是孙中山“三民主义”(民族、民权、民生)理论,都主张将民族革命与制度变革(推翻帝制实现共和)毕其功于一役。光绪三十三年,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加入同盟会,率众在钦州起义。他在自述由“反清复明”到接受孙文革命纲领的转变时说:“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,未足以强国,必兼树国民主义,以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为根本,扫专制不平之政治,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,行土地国有之制度,使四万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。”^②上述事实说明,近代中国的发展已对社会变革提出更高要求,而“反清复明”的传统诉求恰恰不包括革新制度的内容。这正是其残余的一点影响力在清末革命大潮中彻底丧失的主要原因。

〔责任编辑 贾 益〕

① (清)胤禛:《大义觉迷录》卷1,第6页上。

② 《中国日报》1907年9月28日。